微博改变社会生态

当“反腐”成为中国微博事实上的主旋律之一，当红十字会、中石化、故宫等机构或企业在微博时代黯然失色，我们发现，从单纯的社交工具到舆论监督利器，微博已经悄悄完成了一次华丽转身。作为一个强大的舆论场，微博正全面参与并影响着现实世界，其作用从某种程度上已不仅局限于简单的个体事件。甚至在可预见的将来，微博或将直接改变中国社会生态和政治语境。

如果是在十几年前，有冤无处诉的人要找媒体曝光时，第一个想到的大概都是央视的“焦点访谈”。如今，他们可能会得到这样的建议：去发条微博吧！

没错，不管你是否认同，2011年上半年以来，诞生不足两年的门户网站微博都在越来越清晰地扮演着这样的角色：舆论监督。当人人都有了便捷平等的发言渠道，真相就在泥沙俱下的混乱中渐渐浮出水面，它不仅是个别网民呼唤公平正义的平台，更包括对地方官场或行业乱象毫不留情的曝光和集体鞭挞。

从单纯的社交工具到舆论监督利器，微博就这样悄悄完成了一次华丽转身。而作为其中的第一波“被试水者”，中石化、故宫、中国红十字会等央企和有关机构不幸撞上了“枪口”，成为被网民集体调侃挖苦嘲笑并层层剥光衣服的“弄潮儿”。

舆论监督新阵地

6月27日凌晨，戴着鸭舌帽的郭美美在夜色中抵达首都机场，面对媒体的贴身追问，她以一句“你们不要这么搞笑”回应后匆匆离去。

这个最先在新浪微博上疯狂炫富的女孩，之前或许不会想到，仅仅一周之内自己就将包括中国红十字会、天略集团在内的机构、企业或个人牵扯进巨大的舆论漩涡。其与中国红十字会某负责人的关系，以及红十字会是否涉及招标违规等问题，都成为被怀疑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网友抽丝剥茧式的“人肉搜索”与持续不断的热议交相辉映，不仅一步步披露着后续的种种谜团和“证据”，更让相关各方压力频频。

“郭美美事件引发反腐行动。”远在德国的一家电台网站如是远观着中国微博的热闹。7月4日傍晚，中国红十字会的微博悄悄出现在网络——其当夜所发的四条微博三条是介绍红十字会的历史，另外一条是相关负责人作出解释的长篇博文链接——但直到此时，这场源于微博、跟进于微博并得到传统媒体呼应的网络事件，仍在进一步发酵，微博上有关郭美美真实男友身份的猜疑和对红十字会透明化的质问仍未停歇。

这是微博监督的典型流程：先是有网友发微博披露某个事实（或某个网友微博引起质疑），然后众网友跟进评论和转发，相关网络衍生品（如漫画、恶搞歌曲）也开始出现，接着在网络或传统媒体上出现深度评论和调查，并同时伴随着微博上不间断的“爆料”，一场微博事件就此达到舆论监督的高潮。

数亿用户（仅新浪微博注册用户就达1.4亿）集体围观并发声，微博的强大影响力自不待言。这个一年前还更多地以单纯的交流平台或“展示自我”为目的的新媒体，一跃站到舆论监督的潮头，过去各种曾经被认为司空见惯的“潜规则”现象，如今都被一并展示在众人面前。

因此，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五光十色的新闻——四川会理县政府网站发布官员视察的“悬浮照”后不得不公开道歉；浙江宁波机场一句“让领导先飞”引发网民对官僚主义无所不在的不满和集体讨伐；中石化广东公司天价购茅台的发票被发到微博后直接将其一把手拉下马，网友填词创作的《我为祖国喝茅台》MV广为流传；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因天价餐发票遭遇通报批评；而在江苏溧阳，“蠢局长”微博直播开房后被停职；广州白云区街道办主任网络裸聊被曝光后近日终于被免职……

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说，中国人已经发现一种针对地方腐败的新工具：微博。知名地产商潘石屹也在微博上感叹：微博正从打假向反腐深入。潘的同行任志强则认为，“从广告到骂人，从花花草草到谈情说爱，从国家大事到阿猫阿狗，天下之大，（微博）无所不能。”没错，微博上不仅有“被精神病者”飞越了疯人院，还有社科院教授倡议发动起波及全国的“打拐行动”；有知名企业在这里遭遇实名举报，同时被认为是“非正常交通事故”的民间调查也可能随时发端于此。当权威不再服众，当信任消逝良久，自发的、同时也是温和的围观就在这个新平台上闪亮登场。

值得一提的是，纵观2011年上半年的微博舆论监督事件，除了一些地方政府外，铁道部、中石化、红十字会等垄断行业或机构，成为被瞄准最多的“靶心”。微博时代，这是否提示我们应该重新审视熟悉的那些“过往”？

质疑一切可以质疑的

爱因斯坦说，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如此看来，微博上扑面而来的质疑之风，有时候可能比最终问题如何解决更重要，或者至少二者同等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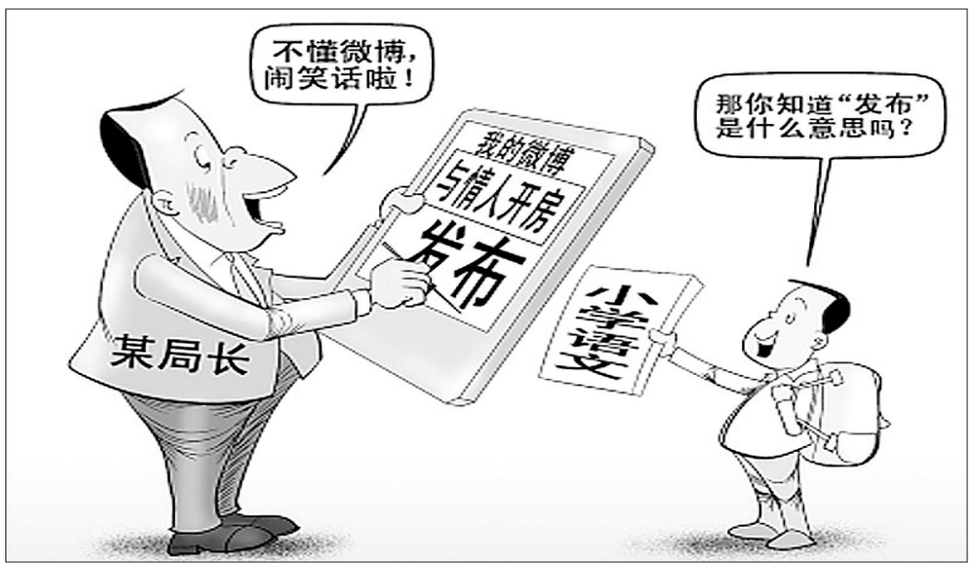
有趣的是，很多时候，微博上的质疑声只是缘于生活中不经意的一瞥。

6月26日，作家郑渊洁随便往楼下的大望桥看了一下，因此就有了一个新发现：“桥上原本标示此处是京通快速路0公里起点的里程牌上，0变成4。就是说京通快速路的起点西延了4公里……好奇心驱使我驾车到京通快速路通州出口察看里程牌，果然原先的12公里变成了16公里。”

郑渊洁的发现引起了央视主持人张泉灵的联想：“这几天正查（高速公路）多收费的时候突然改，让人浮想联翩啊！”张泉灵按照每公里0.6元收费标准计算了一下，修改成16公里后收费应是9.6元，“收十元就合理多了”。

为何多出4公里？面对媒体的追访有关方面语焉不详，而微博、论坛上指责公路管理公司为使收费合理化“弄虚作假”的声音已是山雨欲来。

同样偶然的微博爆料发生在山东青岛。6月30日，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胶州湾跨海大桥建成通车。随后有网友在桥上走了100米后发现，跨海大桥上匝道附近多处螺丝松动。这个被称为“有图有真相”的微博发布后，投资方山东高速集团立即做出了回应和解释。



（资料图片）

遭遇质疑的不仅是桥和路。6月23日北京的一场大雨令微博上热闹了好几天，对市政部门、城市规划部门、交通管理部门的各种嘲讽和揶揄铺天盖地；在内蒙古，一条3年前的视频则将蒙牛推到风口浪尖，“供香港牛奶比内地产品更安全”的说法不过是该企业今年在微博上遭遇的众多质疑之一；而南京为修建地铁欲砍掉有着百年历史的梧桐，甚至引来中国台湾国民党中常委邱毅在微博上的关注。

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曾有言曰：质疑是迈向哲理的第一步。所以，尽管发端于微博的质疑声可能有些只是误解，但接受公众的监督是一个现代企业或政府机构管理者的天职，回应公众的疑问更是它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让强势一方做事时不得不考虑民众的反应，微博所推动的，其实正是整个社会的生态平衡。

名人被摊在“微博阳光”下

与普通人相比，名人就是强势的一方。过去习惯了被远观和仰视的他们，如今在微博上却不过是泯然众人。尽管也有粉丝的热烈追捧，但在相对平等的平台上，遭遇质疑甚至是形象大逆转亦并不鲜见。

最新一个例子，当属演员吕丽萍在微博上的言辞遭遇炮轰事件。6月25日，美国纽约州通过了同性婚姻合法化提案。第二天吕丽萍就发布反同性恋的言论，立即掀起轩然大波，当年清纯的“葛玲”被认为是真的“嫁鸡随鸡”了。

再来看看另一个名女人杨澜的境遇。受“郭美美事件”牵连，杨澜十几年前向希望工程捐款的旧事被网友翻出，称其捐款后又从青基会取走现金20万。最后杨澜不得不发表声明，解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20万现金是受希望工程委托用于海外推广），其夫吴征亦亲自上阵，在微博上为妻子辩护。

尽管难免出现“误伤”，但接受舆论监督本就是公众人物必须要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包括：不分过去还是现在，名人所做的一切都可能被作为“呈堂证据”，随时被端上台面接受检验。

享受如此待遇的，还包括那些为人师表的大学教授们。前些天，清华大学一知名教授就因“传谣”（转载了对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之一马悦然评价的一条微博），遭遇后者实名举报，称其“没有专业知识，也没有学术良心”。而另一个遭遇网友质疑的则是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董藩，其40岁时没赚4000万“不要来见我”的言论，被认为是以财富论成功。

当然，微博对名人来说也是一柄双刃剑，有人在群众的监督下走下神坛，也有人被重新认识。比如任志强，从当年“全国人民最想打的人”一跃变成了微博上最受欢迎的人之一。反过来说，2011年上半年，陈光标则遭遇了可能比过去所有岁月加在一起总和还要多的质疑。

管理者的媒介素养面临考验

这是一个逐渐走向宽容和平等的时代，任何用旧有思维看待今日世界的行为，都可能要遭遇现实的无情嘲笑。只不过，微博碰巧承担了这样的平台和工具角色，监督名人，监督社会管理者，也监督每一个平凡的你我。它就像一面多棱镜，映衬着当今社会的光怪陆离，同时也对管理者如何尊重民意提出了新的挑战。

5月26日，江西抚州市检察院等机构附近先后发生三起爆炸，犯罪嫌疑人钱明奇当场死亡。这起后来被称为抚州“5·26”案的爆炸发生一个月后，被官方媒体认为是“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根据新华社6月26日的报道，犯罪嫌疑人钱明奇早已开通了微博，并且在上面反复诉说自己的楼房被非法拆除遭受巨额损失，十年诉求未果的经历。“但是，网络无法改变钱明奇在现实世界中利益表达渠道的缺失。”

网络没有改变的渠道缺失并不是网络的错，而是对地方部门如何利用网络收纳民情民意的一次考问。《人民日报》6月30日即发文反思“微博之力如何撬动现实”，文章称，面对公众通过微博介入公共事务、表达个人观点的“不可逆转现象”，社会管理者的媒介素养尤显重要。

事实上，中国官员早就意识到了微博的重要性。在香港大学中国传媒项目研究员班志远看来，中国开始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其实也正在成为“互动式执政”长期趋势的一部分。与之相对应的是，根据复旦大学发布的《中国政务微博研究报告》，截至今年3月，实名认证的政务机构微博有1708个，政府官员微博720个。

对于这个数据，有人认为说明官员和政府机构开微博已“蔚然成风”，也有批评认为还“远远不够”。但不管怎样，面对微博上愈加热闹且威力巨大的舆论监督，任何忽视推诿的态度都将在现实面前碰壁已是不争的事实。

好在一部分中国官员早已走在了互联网前沿。7月4日上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与网友对话，充分肯定了包括微博在内网络问政的积极意义。同一天傍晚，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在乌鲁木齐“逛”夜市，陪同的新疆一宣传部门官员在新浪微博实时发布照片图文“直播”。而在南京，有关部门也出台规定，突发事件要在事发后1小时内在微博上公布。中央党校副校长陈宝生也曾表示，中央党校非常重视网络等新媒体在干部教育培训中的使用，注重引导学员掌握新兴媒体特别是网络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如此说来，今后因不懂微博而闹出糗事的官员应该不会再有——如果他们真的要好好学习的话。

新华社在前述题为《把群众路线“传家宝”运用于虚拟世界》的文章就表示，微博打开了官民沟通的新局面，中国共产党正在将“群众路线”这个“传家宝”运用于虚拟世界。文章引用专家的话称，互联网既是“民意库”，也带来了新挑战。“我们和别的国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恰好跟社会转型遇到一块了。”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戴焰军分析。

那么，虚拟世界的群众路线如何保障？戴焰军的答案是：关键还在于使群众路线落到实处，真心实意为老百姓谋利益。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得同样直接，“从根本上讲，还是要保障老百姓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而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中国网络上“凶猛”的微博也引来了境外有关国家和地区机构的关注，并成为其公关中国民众的舞台。出使中国之前，美国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在与华盛顿华人侨领会面时表示，对中国日益流行的微博很感兴趣，坦言自己需要进一步熟悉情况。而随着大陆客台湾自由行的启动，台北市观光传播局的微博“趣台北”也在新浪开通，旨在提供台北旅游资讯，并很快吸引超过3万粉丝关注。

据新华社

行政问责的信任危机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网易新闻中心，对1930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93.2%的人认为当前行政问责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问题，其中58.6%的人认为问题非常多。受访者中，21.1%的人为政府公务员。

调查发现，问责制度在老百姓眼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排名前三的分别是：点到为止，问责只做表面功夫(79.7%)；问责变成“顶责”，找替罪羊(77.1%)；明降实升，虚假问责(76.6%)。而国土资源部对违反土地管理法规责任人员的问责引发公众不少质疑，网友将其戏称为“拍苍蝇式”问责，就是公众不满的证明。

就笔者的观察，无论是“点到为止”还是问责变成“顶责”，或者是其他，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也把行政问责拖到了危机之中，导致行政问责至少面临着信任危机、责任危机、公正危机，使其效果大打折扣，由此也就出现了93.9%的人期待行政问责全程公开。

我们知道，信任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没有信任，社会自身的正常运转将会出现危机，而问责制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对官员的问责，以建立廉洁、高效、责任政府，提升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但当众多官员“大事化小”甚至“干部被问责后，不久就会在异地或者其他部门悄无声息地上任，有的干部甚至还官升一级”时，政府怎能不陷入信任危机、责任危机、公正危机之中呢？并且也使人们对问责制产生了质疑。

当下，尤其应注意的是同体问责蕴含的信任危机。我国行政问责大多采用同体问责——政府内部上级对下级的问责。同体问责之下，上下级存在着责任连带关系，导致问责主体和问责客体难以做到责任分明，于是官官相护成为官员的本能。而且在实际的问责中存在着避重就轻的现象，致使责任落空。而在官员问责异化为“走过场”的同时，就动摇了问责制的合法性基础。

与此相关，问责官员“官升一级”或“异地复出”现象也造成了诸多危机。现实中，不少被高调问责的官员，停职的时间实际上成了“带薪休假”，但这让民众怀疑——问责是不是仅仅为了给愤怒的公众以心理安慰，问责是不是逃避责任的幌子？

面对93.9%的人期待行政问责全程公开，笔者以为，我们应厘清两个问题，一是必须弄清楚官员向谁负责的问题。政府及其官员到底要向谁负责，这直接关系到问责制的性质和方向。根据现代民主理论，人民是国家权力的主体，政府及其公共权力产生于人民的同意和授权。因此，要求官员在行政过程中，既要对上级负责，更要对社会公众负责。也就是说，应抛弃那种“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人民负责”的陋习。

二是必须保证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既然政府责任的最终负责对象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当然有权了解政府履行职责的情况。但是，我国政府和公众之间存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官员在做什么、怎么做，公众并不知情，对于官员的降职、责令辞职的程序、原因，公众知之更少。没有信息公开，人民群众就无法对政府及其官员的工作情况作出评价，更谈不上参与和监督，当然也就无法启动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问责。也就是说，93.9%的人期待行政问责全程公开是一种切中现实弊端的要求。

但愿93.9%的人期待行政问责全程公开不是奢望。**朱四倍**

警惕道德退化的“许霆式遮羞布”

两个月前，在杭州打工的张青到银行给家里汇款时，发现自己还没插卡，按键时ATM机就自动“吐钱”，接连摁了六次之后，取出来的10500元却成了“烫手山芋”。两小时后，他就向警方自首。只是，因为过分慌张，他又把钱弄丢了。尽管事后张青用自己的钱归还失主，但是，他还是因涉嫌信用卡诈骗罪被杭州江干区检察院提起公诉。（《今日早报》7月13日）

首先有必要厘清一个事实：这起所谓的“杭州版许霆案”，其实与当年的“许霆案”没有丝毫的关系。许霆是利用自动取款机的故障恶意取款获利，而杭州这起案件则与之有着本质的不同——从报道的情况来看，分明是有失主忘却银行卡存留于取款机之中离去，而张青则是贪婪之心难以控制最终付诸行动——从别人的银行卡上分批取出了一笔万元巨款。这与捡到银行卡或者钱包，完全是两码事。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毫无争议。可以说，在本案中，ATM机没有出现故障，也与银行责任无关——将之“渲染”成“杭州版许霆案”，非常的牵强附会。

从一开始到现在，媒体和公共社会对于“许霆”们的关注，无非是出于民权保障和司法公正最大化的考量以及对银行责任的考问和追思。但谁也不能否认，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许霆确实是触犯了法律。银行的责任归银行的责任，法律需要进一步完善那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可许霆的“罪行”必须要直面——171次恶意地取款，法律责任无可推卸。

抛开法律不说，在道德上，许霆交了一张白卷，尽管这样的“白卷”引起了世人的同情，但终归还是道德污点。然而，许霆的道德缺陷，却因为公共舆论对“强者责任”的强烈声讨而被掩盖、被回避甚至被美化，以至于出狱后的许霆面对媒体坦言“从没有后悔过”，还以民权代言人和道德斗士的面孔自居。或许到现在很多人也没有搞明白，法律固然欠公共一个说法，但许霆同样也欠社会和道德一个说法。

更需要指出的是，回顾梳理近几年来各地出现的“××版许霆案”，我们便不难发现，其间更多的是牵强附会的“联系”与“生搬硬套”，只要与ATM机有关，统统被冠之于一顶“许霆化”的悲情主义帽子。一如杭州这一次的案子，明摆着是见利忘义，却还是被人为粉饰成了“弱势者的迷惘”——无节制、无原则、无意义的廉价的同情在网上泛滥成灾，这种情绪披着“许霆式遮羞布”甚嚣尘上，无疑意味着某种道德是非标准混淆、道德底线退化的现实语境。

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某种意义上说，法律制度天然存在继续探究和争论完善的空间，但道德底线却只有一条，善就是善、恶就是恶，当道德底线沦落到“小偷偷了钱还要抱怨失主钱包太鼓引起诱惑”的程度，岂能不令人遗憾和悲哀。 **陈一舟**

大学不应只比“大”不比“学”

高校同质化，是中国高校发展中应该认真解决的问题。同质化，首先表现在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同质化。许多高职院校想“专升本”，升本之后想招硕士，招了硕士又想招博士，最终都想办成研究型大学。这样大家都在一条道上走，势必形成“千校一面”。

同质化，还表现在由于扩招和合并，许多本科高校办学规模求大，专业设置求全，行业特色型高校的特色专业被“稀释”。以前，地矿院校专门搞地矿，农林大学专门研究农林，各有所长。但现在很多高校，都朝着学科齐全的方向努力，专业设置也差不多。大多数院校都有英语、计算机、财经与会计专业，全国居然有1400所高校设有艺术类专业，占全国高校（包括高职）的60%。

造成同质化的原因很多，最关键的是现行的高校考评模式和评价标准存在问题。评估体系基本上是根据精英教育、研究型大学的标准来设定，着重于学术评价。在评价体系中，最重要的衡量参数是学校规模、层次和学位点数量。高校之间比“高”与“大”，而不比“学”，这对高校是一种误导。另外，还有行政管理的问题。高职院校是副厅级，本科院校是正厅级，如果学校进了“985”，可能就是副部级，不仅仅是领导地位提高，整个学校的地位也提高了。

高校同质化所带来的问题不可忽视，那就是很难满足社会对多样化人才的需求。社会需要科学家、理论家，但也需要大量工程技术人才，大量服务第一线的技能型人才。 **潘懋元**

是喜是忧？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示，半年国内生产总值20445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6%。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5700亿元，增长3.2%；第二产业增加值102178亿元，增长11.0%；第三产业增加值86581亿元，增长9.2%。从环比看，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2%。1~6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比增长5.4%。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增长7.0%。 **焦海洋**/图

公众为何对GDP越来越冷漠？

统计局7月13日发布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204459亿元，同比增长9.6%；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26250亿元，同比增长32.9%；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12076元，实际增长7.6%。

上半年GDP数字一公布，经济学家们纷纷展开了各自的专业解读：数据击碎“硬着陆”猜想；经济增速超预期，紧缩有本钱继续；中国经济总体良好，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诸如此类。然而，面对超过预期的GDP增速，民众的反应却普遍异常冷漠，最流行的看法是：GDP增长再多与我何干？房子还是买不起，医院还是住不起，教育还是负担不起，甚至连猪肉都快吃不起了。

然而，经济学家肯定会斥责这样的小民看法纯属无知，因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要提高所有人的福利。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或者从世界各国来看，GDP增长与人民福利的增长基本都是同向变动。GDP表示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这代表一国的经济实力和财富，是人民福利增加的基础。没有GDP的增长，绝不可能有福利增加。然而，理论毕竟只是理论，在很多人看来，GDP只是领导们捞政绩的事，与小老百姓八竿子打不着——GDP增长的好处公众体会不到，体会到的只是“工资不涨什么都涨”，通胀日益厉害，物价越来越高。

一定程度上，国民对GDP的冷漠态度和隔阂感，或许与GDP指数本身的局限有关。套用前美国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的话说，GDP既不表现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没有反映社会的教育质量；既不代表文采的优美，也不体现家庭的和谐；既不证明辩论的智慧，也不显示政府的廉洁。但是，公众对于GDP的冷漠，更主要的还是一种被数据背离的失落感、受骗感甚至被剥夺感。

财政收入增幅连年超过GDP增幅，而居民收入增幅却远远落在GDP增幅之后，其中，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更是22年连续下降。这至少说明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在GDP快速增长带来的发展成果分配上，国家所得远超民众所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国富民穷”；其次，随着GDP增长，收入分配差距也日益扩大，对于收入总是“被平均”的人们来说，GDP增加反而会引起他们福利的下降。

这时候，GDP增长越快，被甩落在发展成果正常分享范围之外的人们，必然会越发感到失落，“不关我事”的情绪越来越浓；继而，人们会感到自己上当受骗，因为自己的贫穷和不幸不仅被无视，反而在“被平均”之后被解读为整体的幸福；更进一步，被剥夺感会油然而生：GDP为什么增长这么快，财政收入为什么增长这么快，富人财富为何增长这么快，还不是因为对我的剥夺，让我的生活越来越不幸福了。

无论这样的想法是否理性，但是我们得承认，GDP好看肯定不如民生幸福，“富民”永远比“富GDP”更重要。中央提出要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而公平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肯定是“体面劳动”的应有之义；只有当真实可感的居民收入增幅能够跟上GDP的增幅，公众才能和政府官员、经济学者一样，为了GDP的超预期增长而同喜同乐。 **舒圣祥**